

清代经学史

章权才 著

平素殊用自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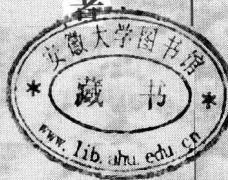
甲辰清和王時敏題



清代经学史

章权才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经学史 / 章权才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 - 7 - 218 - 06893 - 0

I. ①清… II. ①章… III. ①经学—历史—中国—清代
IV. ①Z126. 274.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411 号

清代经学史

章权才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周米亚

装帧设计：张力平

责任技编：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 - 7 - 218 - 06893 - 0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9.5 插 页：1 字 数：250 千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8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经学中经世致用	
思潮的泛起	13
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13
二、经学中空疏之学的泛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阻滞 作用	18
三、以“务以实用”为理论特色的罗钦顺、王廷相 的经学	22
四、泰州学派的平民色彩与王艮的“五经总义”	29
五、主张体行合一，提倡有用之学的东林学派顾宪成、 高攀龙的经学	36
六、易堂九子与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科学家 方以智的《易》学	41
第二章 清朝初年“敦崇正学”的方针与“异端”	
的活跃	48
一、清朝的建立与清初“敦崇正学”的指导思想	48
二、在“天崩地解”中经学群体启蒙思潮的涌动与 “异端”的活跃	54

三、以《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旨》为 代表的孙奇逢经学思想的时代性和斗争性	59
四、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学研究与“舍经学无 理学”命题的理论历史意义	65
五、黄宗羲的《明儒待访录》与《明儒学案》以及他 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72
六、王夫之的《易》学成就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 积极进取精神	78
七、颜元、李塨的经世论及对王学流弊的清算	86
第三章 康乾时期的文化专制与经学研究新流势	95
一、康乾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思想文化的 活跃	95
二、康乾时期的文字狱与经学研究新流势	101
三、从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向康乾考据之学过渡 的代表人物	111
四、惠栋的《周易述》。乾嘉学派中的吴派在考据学 方面的主要成就	121
五、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乾嘉学派中的皖派 在义理学方面的建树	129
第四章 鸦片战争前夜社会矛盾的发展与常州今文学派的 兴盛	143
一、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危机的深化	143
二、扬州学派对皖派义理之学的继承和发展	147
三、以阐发微言大义为着眼点、旨在推进社会改革的	

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刘逢禄的《春秋公羊》 学	160
四、喜以经术作政论、旨在推进社会政治改革的 龚自珍、魏源的《公羊》学	189
第五章 清朝后期内外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与经学群体在 本末体用问题上的思想斗争	211
一、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统治思想的冲击	211
二、西学东渐的新形势与学术思想界的驳杂回响	217
三、以宋儒程朱之学是颂是崇的曾国藩的经学	221
四、邵懿辰的扶持“正学”与他的《礼经通论》	227
五、张之洞的《劝学篇》及“中体西用”说	234
六、以发明义理为目的，归结于经世致用的陈澧的经学	239
第六章 戊戌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泛起。以托古 改制为理论特色的康有为的今文经学	244
一、19世纪后半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泛起	244
二、康有为的社会出身和学术渊源	246
三、康有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逐渐展开	250
四、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根据的《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	252

【清代经学史】

第七章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展开与进步思想家

章太炎的古文经学.....	266
一、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展开。	
思想领域新的斗争形势.....	266
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的反清斗争实践与经学	
撰作.....	270
三、章太炎对顾炎武经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73
【附】 清代经学家著述要目一览表	283

—

清经学史，顾名思义是清朝经学的断代史，时间跨度是从 17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约二百六十多年光景。

清代经学，时间虽然不长，但内容非常丰富，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皮锡瑞《经学历史》以“经学复盛时代”许之，这是有部分道理的。但他把经学的复盛，总归于“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这就不免失之偏颇，也显得肤浅。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和分期，百多年来，学术界见仁见智，异说纷呈。皮锡瑞有自己的看法，梁启超、章太炎有自己的看法，现当代许多经学史研究专家也有各自的看法。

“国朝经学凡三变”，这是皮锡瑞的看法。所谓“三变”，是指清初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为主许、郑的专门汉学；嘉、道以后，由东汉返西汉，主今文十四博士之学。

范文澜先生《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演讲稿中，把清代经学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清初，是新汉学的萌生；乾、嘉时代，是新汉学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经学陷于“山穷水尽”直至走向消亡。

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专门辟了一章，纵论“清学”。他也把清学分为三期，但分法与范文澜先生有所不同。三期分别是：清初的启蒙期，清学以北派和南派为中心，共同致力于反王学的斗争；清中叶的全盛期，清学以乾嘉学派为中心，把经学中的考据与义理之学发展到新高度；清朝后期，清学以常州今文学派为中心，把经学与改革时政结合起来，强调经世致用。

1992年12月，台湾学术界举行了一次清代经学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发表了有关论文15篇。林庆彰教授为论文集写了一篇《导言》。开头即云：“清代两百六十八年间的经学，如果仔细加以分析，约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合计九十二年，是理学逐渐衰落，清学渐次兴起的时期，也可说是清学的建立期。二是乾隆、嘉庆二朝，合计八十五年，是清学大为发皇的时期。三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合计九十一年，是清学转变、衰微和西学入侵的时期。这三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

和应面对的时代课题，所呈现的经学面貌也各不相同。”这种对清代经学的分期，又具自身的特色。

对二百多年清代经学的流变，对它的性质的认定和分期，怎样做到准确？怎样才算科学？大可敞开讨论。事实是，如上几个表似不同的分期，实质上存在着许多共同点或交叉点。我们可以求同存异思想指导下，求得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必须指出，经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学，虽然摇曳多姿，千差万别，但它毕竟是属于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有个历史继承性问题，但它总是立基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要由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来解释、来说明。经济基础、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它是上层建筑包括经学变化的源和本。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经学史的基本理论和共识。

基于此，我们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应该说，这也是把握清代经学的基本线索。

二

历代经学都存在一个“正学”问题。“正学”与异端邪说相对而言，它是指朝廷认可推崇的理论体系。清朝建国伊始，就崇儒重道，着力建立自己的统治思想。康熙八年，即公元

1669年，朝廷向全国颁发了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所谓《圣谕十六条》，其中有一条就讲到“黜异端而崇正学”。“正学”要崇，“异端”则要黜，这是清朝在意识形态领域所执行的坚定不移的国策。崇和黜，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有力导向，实现政治局面的趋和和长治久安。

什么是清朝推崇的“正学”呢？和亲王昭梿过一本书，叫《啸亭杂录》，里面谈到康熙在经学领域的好恶取舍，说：“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尝出礼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康熙五十一年谕大学士：“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用，皆明白精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应作……崇礼表彰。”（《东华录》五十一年）清初经学家陆陇其就康熙的经学导向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子敦崇正学，程朱之学复行于世。”《三鱼堂文集》卷八《周永瞻先生四书断序》由此可见，清初诸朝，朝廷十分重视“正学”的择定，而其所择定的“正学”，就是程朱之学。

必须指出，把程朱之学推为“正学”，并非清朝始。南宋末年，庆元党案解除，朱学便开始得到南宋统治者的认可和推崇。元朝，朱学上升为官学，“定为国是”，朝廷明令科举考试一以朱熹《四书集注》及五经的朱学传注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进入明朝，朱学的统治地位牢固确立，朱元璋一再诏示：“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会》撰定，朱学的统治地位最终确立。清朝把程朱之学定为“正

学”，不过是这一决策的历史延伸罢了。

清初推崇“正学”，措施是多方面的，但有两条措施格外引人注目：一条是经籍的择定，一条是经学楷模的认准。对于经籍的择定，朝廷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据载，康熙三十八年、五十四年、六十年，乾隆十三年、二十年、二十三年，先后对《春秋》、《易》、《书》、《诗》、《礼》等方面的经籍教本，进行甄别择定，并颁布御纂：《周易折衷》以程传及本义为主，《书经传说汇纂》以蔡沈集传为主，《诗经传说汇纂》以胡安国春秋传附于三传之末。可见这些御纂，所尊所重，仍不脱程朱之学的窠臼。

对于经学楷模的认准，朝廷尤其审慎。据载，清初受到朝廷表彰的经学家颇多，但最具代表性的不外三位：一位是直隶柏乡的魏裔介，一位是河南睢州的汤斌，一位是福建安溪的李光地。另外，朝廷对河南仪封的张伯行、山西蔚州的魏象枢、湖北孝感的熊赐履等等，也是表彰有加。这些受表彰的经学家，有个共同点，就是高举程朱之学大旗，致力于建立程朱之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

三

清代建立统治思想、确立程朱之学为“正学”的过程，是一个斗争过程。里头不仅充满着各种“邪说”对“正学”的斗争，也存在着地主阶段改良主义对传统思想的冲击。

清初经学中的实学思潮对王学和对蹈虚之学的批判，是清代思想领域斗争的序幕。历代经学中的经世致用传统的存在，明清之际王学的流行给社会带来的痼弊，明清政权的更替和民

族压迫政策的推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起……各种社会政治原因的综合，就构成了清初实学思潮涌动的基础和前提。

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性之学的流行，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阻滞作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王阳明的后学弟子视王学跟禅学相仿佛，这是件令人寻味的大事。

清初反对王学，倡导实学，有“南派”与“北派”之分。南派代表人物是颜元和李塨；北派代表人物是顾炎武和黄宗羲。两派都是王学的反对派，都主张经世致用，都主张联系实际反对空谈。旗手自然是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顾炎武对明中叶以来逐渐流行的空疏之学进行了坚决的讨伐。他说：“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已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人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谓圣

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顾亭林文集》卷三）又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尚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见《日知录》卷七）顾炎武联系历史，联系明亡的现实，对明清之际流行的心学和空疏之学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乾嘉汉学即考据思潮的出现及其对空疏之学的批判，是清代思想领域斗争的重要内容。“汉学”与“宋学”是相对而言的。“宋学”歌颂的对象是程朱之学；“汉学”弘扬的对象是汉代考据训诂之学，是唯汉是尊，唯许郑是从。过去学术界有些人对“汉学”存有误解，认为“汉学”是脱离政治，远离现实，为考据而考据，没有思想内容。其实，“汉学”有个发展过程。顾炎武是“汉学”的开山祖，他既强调“博学于文”，又强调“行已有耻”。他在考据音韵之学上有很多建树，但他强调经世致用，强调考据不过是通经致用的工具。乾嘉时代，“汉学”进一步发展。章太炎说：“多忌，故歌诗文史楷；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检论·清儒》）这揭示了乾嘉汉

学得以发展的社会政治根源。乾嘉学者出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出于文化高压政策的原因，对政治一途噤若寒蝉。他们发展了由顾炎武开创的早期汉学的“傅学于文”那一部分。乾嘉学派的典型代表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和皖派都是一个经学群体，都包括了一大批经学家，在考据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大贡献。《皇清经解》收有 157 家，书 2727 卷，多数是吴派和皖派的撰作。但必须指出：无论惠栋和戴震，他们的经学都不是纯粹的考据之学，他们的论学都不同程度涉及义理，戴震为首的皖派尤其突出。还必须指出，乾嘉考据之学有个锋芒问题，这个锋芒，就是指向经学研究中的空疏流弊。他们用无征不信的考据成果，批判明清之际在学术界流行的乱说一气的蹈虚之学，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嘉道之际常州今文学派的崛起，以及他们在学术领域中对保守势力的批判，是清代思想领域斗争的又一重要方面。常州今文学派是嘉道之际，即鸦片战争前夜活跃在常州地区，以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为代表，以挖掘《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重点，旨在推进政治改革的一个学派。嘉道之际，昔日延续了近百年的所谓“康乾盛世”已成过去。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内部斗争异常尖锐。加上西方列强商品输入和武力压境，整个社会垂暮景象已见端倪。社会存在着变法改革的客观要求，而改革的要求又促进了经学的自我更新。于是，常州今文学派便迅速崛起。从学术渊源上看，拿吴派和皖派相较，常州今文学派继承戴震的学说更多些，继承经学中的义理之学更多些。大较而言之，常州今文学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兴起阶段以庄存与为代表，经学特色是重视《春秋》；发展阶段以刘

逢禄为代表，经学特色是重视《公羊》中的“微言大义”；创新阶段以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经学特色是由学术引向政治，力主改革时弊。常州今文学派挖掘《春秋》《公羊》学中的微言大义，强调变革时政，这就必然触及经学中的守旧势力，也必然触及对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应作如何评估的问题。对此问题，魏源有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余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爪剖剖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传》，见《魏源集》）应该肯定，“汉学”在其发端的时候，是强调经世致用，强调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汉学发展到乾嘉，强化了考据之学的研究势头。从总体上看，当时考据之学在当时反对空疏之学的斗争中是起了作用的。同样应该肯定，在乾嘉汉学发皇的时代，确实也存在一种偏向，就是有些人置四海灾难于不顾，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现实，钻故纸堆，钻牛角尖，为考据而考据。这种不健康的偏向也是必须正视和批判的。魏源的一席话充满着时代感和责任感。他对乾嘉学派的评价是否准确，可以讨论；但他指出乾嘉学派存在脱离实际的偏向，无疑值得肯定。

19世纪后半期，反映资产阶级改良派利益的托古改制思潮对守旧势力的批判，是清代思想领域的最强音。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母体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微弱，但毕竟成为社会新的客观存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武备

为主要支点，在各地兴起了练新军、购洋器、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电报的热潮。西方科学技术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也开始发展起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他们一走上政治舞台，便用阶级来判断利益。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与腐朽的封建制度不断发生矛盾。这样，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一个崭新的思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便在中国大地澎湃开来。代表人物是政治家、经学家康有为。有为一生著述甚多，但三部著作是最主要的：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一部是《春秋董氏学》。这三部成书于戊戌前夜的著作，不仅体现了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历史继承与理论重构，而且体现了他经世致用、变法改制的总的政治取向。从三部著作可以看出，康有为不仅继承了今文经学，而且企图把几千年来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经学，特别是新兴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董、何之学，改造成为维新变法的经学，改造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工具。这就必然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坚决反对。这种反对的声音，可以从苏舆编辑的《翼教丛编》看出，苏舆在《序文》中说：“甲午以来，外患日逼。皇上虑下情之壅阏，愍时艰之勿拯，博求通达时务之士，言禁稍弛，英奇奋兴；而倾险淫诐之徒，杂附其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张其师说。其言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坠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在经学以至政治思想领域，顽固派反对维新派的激烈程度，于此可见一斑。